

宁波籍买办与“宁波帮”的崛起

“宁波帮”商人早在明末清初即已形成,并取得了不断发展,但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仍与徽商、晋商等其他各商帮一样,尚未超脱传统商人的模式,以至19世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大办洋务,创办民用企业的时候主要依靠广东籍买办商人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1882年在轮船招商局实收200万两资本中,徐润一人就投入48万两,加上其亲戚朋友的五六十万两投资,几占轮船招商局实收资本的一半。^①但自19世纪末开始,“宁波帮”商人便脱颖而出,迅速崛起,在中国民族工商业界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除了“宁波帮”商界全体同仁的努力以外,宁波籍买办势力的形成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一

近代买办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产生的。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贸易,均听其便。”^②亦即所谓的取消行商,自由贸易。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才刚刚开放,中外商人之间尚未建立起商业信用。华商行会垄断了市场,尤其是乡镇初级市场,外商很难打入中国市场,加上中外商人之间语言不通,习俗不同,很难进行直接贸易,必须通过一个中间媒介。这样,近代买办便应运而生了。

当然,外商买办不是鸦片战争以后才有的,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即已产生。当时清朝对外只开放广州口岸。中外贸易由开设在广州的公行即所谓的“洋行”垄断。

^① 《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1927年铅印本,第37、86页。

^② 《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页。

外商在华期间,住在公行商馆或外商商船上,由澳门同知和公行行商为他们雇佣买办为其服务,为商馆里的外商保管财物、书信,清算账务;为商船上的外商采购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由澳门同知和公行行商给他们发放“印照”和腰牌以供验证。因此那时的买办只不过是“一种为外商服役的仆役头目”。^① 鸦片战争以后的买办就不一样了,已由外商直接雇佣,不受中国政府管理。1844 年的中美《望厦条约》规定:此后外商“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书手,雇用内地艇只,搬运货物,附载客商或添雇工匠、厮役、水手人等,均属事所必须,例所不禁,应各听其便。所有工价若干,由该商民等自行定议,或请各领事官酌办,中国地方官勿庸经理”。^② 这样,鸦片战争以后的买办无论是性质、职能还是地位,都与鸦片战争以前大不一样了,已不只是为外商服役的“仆役头目”了,而是外商在中国的“华经理”,外商洋行和银行的“独立代理人”,外商老板的“人格和信用的化身”,外商洋行和银行的“真正所有者”。^③ 他们除负责外商老板的一切生活起居、财务、进出口货物的打包、解包、装卸、检验外,同时代理洋行和银行的行务,代理外商经销生意,代表外商与华商洽谈业务,签订销售合同,把外商老板进口的商品推销出去,为外商采购出口土货,甚至赴内地执行采购任务,代表外商银行对中国钱庄拆借贷款,融通资金等。

鸦片战争以后的买办,开始时主要是广东人。因为广州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即已对外开放,在公行从事对外贸易的行商、通事(翻译)和一些鸦片贩子早已熟悉外商情形,也懂得一些外语,了解对外交易方式,所以开始时买办主要由这些人充任。19 世纪 40 年代,旗昌洋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时,就从广东带来了林显扬、顾丰盛和昌发三名买办,以及与林显扬共同负责分享利润的何顺。怡和洋行在上海最早的买办阿三、阿陶和宝顺洋行 40 年代在上海的买办徐钰亭也都是从广东带来的。后来怡和洋行在上海的买办也大都是广东人。直到 70 年代初,上海各洋行的买办也都“半皆粤人为之”。^④ 在 60 年代初期之前,其他各口岸的买办也主要是广东人。^⑤ 如琼记洋行在广州的买办阿陈、阿朱、林钦,在香港的买办阿陶、阿朱、莫仕扬、阿春,在福州的买办唐隆茂、阿启,在九江的阿明、梁南记、阿熙、阿童、阿超、阿兴,在

① 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第 3 页。

② 《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第 88 页。

③ 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第 22 页。

④ 王韬:《瀛壖杂志》卷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8 页。

⑤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年,第 61—62 页。

汉口的买办瑞生、协隆、刘绍宗等，莫不是广东人。其他洋行如旗昌、怡和、宝顺等等也都是如此。

但是，随着对外贸易的日益发展，江浙和其他地区的买办和买办商人也开始兴起，尤其是宁波籍买办和买办商人发展尤速。因为宁波濒临海滨，处在南北洋海岸线的中间，该地商人早就开始外出经商，北至辽宁半岛，南至闽粤，直到内地各商业城镇，莫不布满了宁波商人，形成了“无宁不成市”的商业网络。鸦片战争以后，各地宁波籍的商人们也积极投入了日益发展的对外贸易，并通过对外贸易与外商频繁接触。他们的经商才干也越来越受到外商的青睐，便一个个被外商聘为买办，或成为买办商人。

宁波籍最早的买办为穆炳元，鸦片战争时在定海被英军俘虏，随英军到上海后，学会了英语，结识了英国人，很快得到外商的信任。因此“无论何人，接有大宗交易，必央穆为之居间”。^① 穆还收受学徒，教以英语和与外商交易的方法。从此宁波籍的买办和买办商人便日渐增加，比较著名的 50 年代有怡和洋行买办杨坊，60 年代有汇丰银行的买办王槐山等等，开始向广东籍买办提出了挑战。杨坊在任怡和洋行的买办时，就曾拒绝了洋行东家为其安排一个广东人阿福做他的副买办，说阿福在上海“没有银钱关系，也没有势力”。^② 杨坊也采用了苏州丝商们的采购制度，将鸦片从上海带到苏州销售，再从苏州采购大量的蚕丝，深受洋行东家的赏识，从而使宁波籍买办势力日渐兴盛，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已压倒了其他地方。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上海的 90 名著名买办中，浙江籍即占了 43 名，几占一半，江苏 31 名，约占 1/3，广东籍只有 7 名，已不到 1/10 了。^③ 自然，浙江籍的 43 名买办主要是宁波籍人士，如叶子衡、王肇元、朱云佐、朱鲁异、虞顺恩、朱子奎、傅品圭、许春荣、许吉泉、刘鸿生、乌挺生、金润庠、黄延方、厉树雄，等等，约 30 余人。

与此同时宁波籍买办在其他口岸也逐步占据了重要地位。琼记洋行汉口分行的代理人 H. G. 布理奇斯 1866 年 4 月 11 日致函上海分行的 A. F. 侯德时说：汉口“这儿最适合洋行需要的是有宁波人买办。他们在招徕货运和推销进口货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优势”。由于汉口的商人都是宁波人居多，“或是同宁波人更接近而

①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47 页。

② 上海怡和洋行 A. G. 达拉斯 1851 年 4 月 4 日致香港总公司 D. 查颠函，转引自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 216 页。

③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 64 页。

同广东人疏远的那些地区的人”，该地只要有“两个宁波人买办”，就能轻而易举地取得成功，且“非常显著”。因此“同宁波人买办一起，便能很容易地做蜡、烟草生意”。^① 天津也是宁波商人比较集中的口岸之一，七八十年代，天津的宁波籍买办也开始兴起，到19世纪末也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先后涌现了如严蕉铭、王铭槐和王采承、王毓承、王步洲、王云洲祖孙三代五人，徐企生、陈协中、叶星海和叶庸方父子二人，杜宪章、吴荫庭、陈吟漱、王品南、周宝英、徐楚泉、严逸文、刘星辉、李炳志、李正卿、李组绅和李组才兄弟二人等等买办，不下二三十人。可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宁波籍买办和买办商人已遍布全国各通商口岸，逐渐成为中国买办和买办商人的主流之一。

二

买办和买办商人已不同于中国过去的传统商人。过去的传统商人虽然已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出现了一些包买主，并与一些实行雇佣剥削的手工作坊联系在一起，但主要还是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以及城乡个体手工业者结合在一起，在他们之间构建了一条商品流通渠道和经济桥梁，尚未超脱自然经济的范畴，经营规模和财力一般都还比较小，经营方式都还比较传统，首重信用。而买办和买办商人则已与外国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融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经营方式上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不是首重信用，而是按照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游戏规则来经营。他们已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是推动中国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渡的重要力量之一，是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代表之一。

首先在财力上，买办和买办商人的收入十分可观。虽然买办的薪资并不很高，19世纪60年代一般月薪100两左右，高的可达150两以上，少的只有20两。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的买办甚至不拿工资。但买办的佣金十分可观，种类也多：有经销进出口商品佣金、经销差价佣金、推销鸦片佣金、生意媒介佣金、货物揽载佣金、担保华商信用佣金，等等。佣金一般1%—5%，平均2%—3%，鸦片推销佣金高达10%，军火贸易佣金更高，可达50%。据估算，1840—1894年全国买办佣金总收入达38 593万海关两，1895—1926年更高达124 824.3万海关两。^② 就个人而言，

^① 琼记洋行档案 HM—23，转引自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216—217页。

^② 黄逸峰等：《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0、101页。

买办佣金每年有数千、数万、十余万元不等,多的“一年佣金达50万元”。^①此外,买办还可以利用他们掌管洋行库房现金的机会,将洋行库存现金借贷给可靠钱庄,所收利息则全归自己。仅此一项,买办的每年收入亦有五六千元之多。^②

不仅如此,买办们还可利用他们在中外商人中所享有的崇高信誉,自行生意,开设字号店铺、钱庄,自置沙船、轮船从事运输,有的大买办还与洋行合资开办公公司,获取利润。1862年旗昌洋行开办的旗昌轮船公司,就吸收了不少买办资本。到1874年,买办们在旗昌轮船公司的投资已达60万两,占旗昌轮船公司资本总额的一半以上。^③有的买办独资、合资开设的字号店铺、钱庄达十几家,自置的轮船达五六艘。而洋行东家对买办在外自行生意也并不反对。因为外商聘任买办的首要条件就必须是一名商人,会做生意,只有会做生意的人才能代理洋行,把洋行搞活,扩大洋行的影响,扩大对华贸易。实际上买办开设的字号店铺许多都是外商洋行上下游的卫星店铺。其中一些洋货铺、洋布庄是专门为承接推销洋行进口商品而设立的。茶庄和各丝、棉土货号是为洋行采购茶叶、蚕丝、棉花等土货出口而设立的。买办开设的众多钱庄,也大都是为外商洋行的进出口贸易兑换货币、汇兑货款、调拨资金和为外商银行拆款宣泄货币服务的。外商自然乐而从之,甚至持积极鼓励的态度。所以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说:“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④《申报》光绪六年(1881年)十二月报导福州南台地区茶叶贸易中的买办活动时也说:“道咸以来,操其术者,皆起家钜万。”^⑤19世纪末香港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何启说:“买办所赚的钱同外商一样多。”而专门研究买办的美籍华人学者郝延平则认为何启的这一估计“在当时还是保守的,因为人们常常认为,买办实际所挣的钱比他们的外国雇主还多”。19世纪末一个英国学者甚至还说买办所得的收入竟然两倍于他的雇主。^⑥

可见买办的财力已非过去的传统商人可比。许多大买办和买办商人都积资达数以百万两计。怡和洋行的买办杨坊就拥资数百万两,他1860年积极资助清朝组

① 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37页。

②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113页。

③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150页。

④ 王韬:《瀛壖杂志》,第8页。

⑤ 《申报》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⑥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135—136页。

织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洋枪队司令华尔。著名买办商人叶澄衷在19世纪末去世时已积资达800万两。至20世纪初,严信厚的资本总额也达800万元。在1897—1910年间,朱志尧先后投资达365.7万元。虞洽卿在1909—1918年间在上海轮船航运业的投资达175万元,未几即增资达460万元。朱葆三也拥资达数百万元。作为一个群体,而不是一两个巨商,拥有如此巨额的积累,这在过去自然经济状态的传统商人,是不可想象的。而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逐步流失,不断集中到了大生产者手中。自然其中大部分被外国资本家赚去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到了中国的官僚、地主、买办和买办商人们手中,成为他们原始积累的资本。

这些买办和买办商人积累了巨额资金以后,到19世纪后期,他们的投资方向也开始发生了改变。除一部分继续开设字号店铺、钱庄、经营房地产外,其他大都投资大规模的工厂企业和近代金融银行。如叶澄衷除早年先后开设顺记、新顺记、南顺记、北顺记、义昌成记等近20家五金洋杂货店,经销轮船机械等五金配件和火油,约20家钱庄票号,110余号沙船,经营海上沙船航运和房地产外,19世纪末又先后开设和参与开设了上海燮昌火柴厂和苏州、汉口分厂、上海纶华缫丝厂、鸿安轮船公司和中国通商银行等。严信厚除先后开设天津同德盐号、物华楼金店及各地分店,在上海、宁波、杭州、汉口等地开设了20余家钱庄外,1887年在宁波又开设了通久源机器轧花厂,以后又发展为通久源纱厂,开办和参与开办了通久源面粉厂、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华新纺织局、龙华造纸厂、锦州天一垦务公司、景德镇瓷业公司、中国通商银行、华兴水火保险公司等。朱葆三先后创办和参与创办了中国通商、四明、浙江兴业、中华商业、江南、中华懋业、浙江地方等多家银行,华安、华兴水火保险,华成保险、华安合群人寿等多家保险公司,上海大有余榨油厂、江苏赣丰饼油厂,中兴、立大面粉厂,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丝织公司、上海绢丝厂,龙华、华丰造纸厂,华商上海水泥公司,和兴铁厂、上海第一呢绒厂、宁波和丰纱厂,柳江、长兴煤矿,定海电器公司、马来西亚吉邦橡胶公司,东方、大达等七八家轮船公司,上海华商等四五家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等。虞洽卿先后创办和参与创办了四明、通惠银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中华懋业银行等现代金融银行业,还先后投资创办和参与创办了宁绍轮船、三北轮埠,宁兴、鸿安轮船公司,三北轮埠公司机械厂,拥有新式轮船30余艘,总吨位9.1万多吨,居当时民营轮运业

之首,等等。一个个都成为了当时中国著名的实业家,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引领广大“宁波帮”商人积极投资近现代工矿企业和金融银行,促进了“宁波帮”商人的迅速崛起,也奠定了江浙财团的基础,使江浙财团得以迅速形成。所谓江浙财团主要是以浙江财团为主体,尤以宁波籍资本集团为台柱。

三

买办不仅在近代中国经济转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在中国近现代政治上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则是外商对他们依若长城,把他们“看作轮轴,靠着他们,所有外国人同本地贸易的轮子得以转动”。^①同时中国政府对他们也竭力拉拢,举凡采购军火武器、举借外债、外交谈判等等,都靠他们居间联系,他们真正地发挥了东西间桥梁的作用;至于发展经济,开展洋务运动,更少不了买办的帮助。19世纪70、80年代,宁波籍买办尚未起势,上海的买办主要还是广东籍居主导地位,所以李鸿章创办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时,还主要依靠广东籍买办商人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但到90年代,随着宁波籍买办和买办商人的崛起,李鸿章、盛宣怀等人创办中国通商银行、三姓金矿等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时,便主要依靠宁波籍买办和买办商人,通过他们吸收宁波籍以及江浙商人的大量资本。宁波籍买办和买办商人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也因此成为中国通商银行的总董,在10名总董中占有其三,朱葆三还是三姓金矿的帮理。^②后来宁波籍的买办傅筱庵、朱子奎、厉树雄也都分别担任过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常务董事和事务局理事,从而使中国通商银行成为“宁波帮”商人的大本营。朱志尧、朱葆三也积极支持和参与了盛宣怀创办的其他企事业。

资产阶级兴起以后,买办和买办商人也大都成为了资产阶级的上层,在资产阶级中享有崇高的信誉,历届中国旧政府也主要依靠他们和其他资产阶级上层控制和驾驭资产阶级。1902年清廷令盛宣怀出面筹办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直至1904年该公所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时,盛都以严信厚为总理。1905年上海商务总会改选,仍以宁波籍买办朱葆三为协理,以后在上海商务总会(总商会)的历次改选中,仍有朱葆三、虞洽卿、傅筱庵等多名宁波籍买办当选为会长、副会长、议董等各重要职

^①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25页。

^② 《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9—100页。

务。天津、汉口等埠的商会中也有不少宁波籍买办如项松茂等当选领导职务。1920年虞洽卿还当选为全国工商协会会长,1925年又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会长,后递补为副会长。其他各商会、行业公会的总理、会长、副会长、总董、议董、主席、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等等则更多,数不胜数,大长了“宁波帮”商人们的气势。

20世纪初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推行地方自治,各省成立谘议局。1912年建立民国,成立国会。1913年袁世凯解散国会,次年又成立参议院,等等,选举地方贤达参政议政,其中自然少不了各地的买办和买办商人,更少不了宁波籍买办和买办商人。

密切买办和买办商人们与历届旧政府的关系,不仅是政府的需要,也是买办和买办商人们自己的需要。一则他们希望通过融洽的官、商关系以获得政府的庇护,或获取某种特权以便顺利地开展各项工商业活动;同时也藉以影响政府的工商业政策,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有时是买办和买办商人们更加主动一些。不仅杨坊他们积极支持清朝镇压了小刀会和太平天国起义,他们发财致富以后也大都捐纳了清朝的官衔,一般都是候补道,这是清朝捐纳的最高官衔,积极支持政府的各项政策举措。宁波籍的买办们也不例外。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即与李鸿章、盛宣怀和上海道袁树勋等建立了密切的私交。虞洽卿与两江总督端方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曾积极推动端方筹办南洋劝业会,并与端方分任筹备会的正、副会长。天津宁波籍的买办也极力拉拢李鸿章、袁世凯、王士珍、张锡銓、孙宝琦、曹汝霖、陆宗輿等北洋派官僚们。汉口的买办们自然也与张之洞、瑞澂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连上海的虞洽卿与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关系也非一般。1917年,虞洽卿即积极支持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复辟和对德宣战,因而被段十分看重,当1924年段重新上台后,即委虞为善后会议的专门委员。未几,又委虞洽卿为淞沪商埠会办。而最典型的例子则是虞洽卿等对蒋介石的支持。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执掌了广州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虞洽卿即安排其女婿盛冠中随上海工商界代表王晓籁赴广州参观考察,拉拢蒋介石,积极支持其发动“四一二”事变,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藉以影响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他们也的确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一个个被委以重任。虞洽卿被委以上海特别市参议会参事、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刘鸿生被委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委员、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长、经济部计划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咨议委员等职,从而大大提高了他

们的政治地位,为“宁波帮”商人们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20世纪20、30年代成为“宁波帮”在旧中国发展最顺利的一个时期。

买办既有与外商和中国政府密切合作的一面,作为资产阶级,也有与外商和中国政府官员们矛盾的一面。一则他们与外商存在着商品竞争和利益分成上的矛盾,而且买办毕竟是中国人,他们大都是爱国的。所以,每当民族和国家安危受到威胁时,他们也大都能站在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上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在上海、天津等地历次反对外国扩大租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上海大闹会审公堂案、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和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他们大都表现出了积极的爱国热情。即如1905年上海大闹会审公堂案中,虞洽卿就“日夜邀集各界代表商讨对策”,“迫使租界当局让步,交涉告胜”。当1919年6月3日五四运动进入高潮时,虞洽卿代表上海总商会“在工人、学生影响下”,^①积极参加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直到曹汝霖等人被撤职时为止。五卅运动爆发时,虞洽卿正在北京出席全国商会联合会会议,得知消息后,对英国巡捕枪杀群众表示“同声愤慨”,指示上海总商会提出严重交涉,“以重生命而伸国权”。^②随后他立即返沪,组织“五卅”事件委员会发表通电,表示:“若人权不得保障,即牺牲亦何足计……一息尚存,此志不懈。”^③积极支持工人、学生们的三罢斗争,并筹款援助罢工工人,参与谈判,监督复工条件的实施等,表现了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

买办们在与西方列强展开政治斗争的同时,还积极倡导实业救国。刘鸿生年轻时就深深“感到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感到“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④于是他们大都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刘鸿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即先后开办了中华煤球公司、中华码头公司、上海水泥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华丰搪瓷厂、章华毛纺厂、煤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等数十家厂矿企业公司。而且他的这些企业公司也大都冠名“中华”、“中国”或“华”字,有时前面还加个“大”字,显然隐喻了他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同时他们还与外商展开竞争,把外商控制的中国市场夺回来。即如当年瑞典和日本的火柴控制了中国的火柴市场,致使中国“小火柴厂受打击而停顿”,刘鸿生便“集资组织大中华火柴公司,先收买小厂,合并小厂,增

① 汪仁泽:《虞洽卿》,《民国人物传》(九),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② 《申报》1925年6月3日。

③ 《申报》1925年6月12日。

④ 刘鸿生:《为什么我拥护共产党?》,《新闻日报》1956年10月4日。

加其实力,与外资竞争”,^①最后终于打破了瑞典与日本火柴对中国火柴市场的垄断,夺回了市场,壮大了中国火柴业。

同时,作为资产阶级的买办也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他们与清朝的封建统治也存在着矛盾。在清末的历次资产阶级的革新运动中,买办也大都站在了革新派的立场上,支持革新运动。如19世纪后期,容闳和郑观应等都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宁波籍买办起势较晚,未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有所作为,但在20世纪初年即大力支持,有的并直接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910年立宪请愿运动失败后,虞洽卿和上海其他一些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纷纷加入同盟会。虞还在上海六马路设立宁商总会,作为同盟会的秘密机关,向香港殖民当局注册,“领得特别照会,使租界当局无权进行搜查,以保证安全”,^②并资助陈其美8000元革命活动经费,大大增强了上海同盟会的活动能量。虞洽卿还在1905年大闹会审公堂案后组织成立了万国商团华人队武装队伍,租界外的工商界人士也纷纷仿效,联合成立了南市商团公会。至1911年上海已有各华人商团20个约1000余人武装队伍,统一成立了全国商团联合会,公推虞洽卿为名誉会长,成为了上海武装起义的主力之一。上海光复后,虞洽卿被任为都督府首席顾问、外交次长兼闸北民政长。朱葆三任财政总长,为上海都督府填支了巨额资金。

上海光复后,虞洽卿又积极游说江苏巡抚程德全和两江总督张人骏起义光复,程于11月5日宣布江苏和平光复,脱离清朝,而张人骏则予以拒绝。于是虞洽卿又积极参与了组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在天堡城激战时,他还亲自为联军押送武器炮弹至天堡城,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虞洽卿、朱葆三等买办和买办商人们在历次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积极表现,也大大提高了他们在广大群众中的声誉和地位,进一步扩大了“宁波帮”商人们的影响。

(原载《江苏文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① 倩华:《火柴大王刘鸿生》,《经济导报》1947年第13期。

^② 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50页。